

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 在川活动研究

郭丽娜·著



本书获得「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资助

学苑出版社

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 在川活动研究

郭丽娜·著

本书获得『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资助



学大师范书局藏
福建图书馆藏
福建图书馆藏



T1038205

1038205

学苑出版社

序 言

自明末以来，至民国年间，四川曾是西方天主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也是影响较大的教区之一。概括言之，天主教在四川等地的活动呈现这些特点：一、传播时间长，持续不断。明代末年，传教士利类思（Buglio Ludovicus）、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进入四川开展活动，之后教会曾遭到张献忠农民军的摧残，奄奄一息。但进入清朝后，虽屡遭清政府的沉重打击，严禁活动，天主教则持续存在，传教士潜入底层社会进行活动，多经折腾，不绝如缕，传承至今。二、信教群众多、国籍神父（即本土神父）多。嘉庆中叶，四川天主教徒约占全国天主教徒总数的 1/4，国籍神父约占全国同类数的 40%。即使进入民国，受多方面的影响，四川天主教徒人数确有下降，其人数仍排在全国前五之列。三、传播地区远，影响广。乾隆年间，在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的努力下，天主教从四川传入贵州、云南及广西西北部；尔后，又传至西藏、东北，以至朝鲜。1803 年（嘉庆十八年），徐德新（Jean Gabriel Taurin Dufresse）曾在崇庆州（今崇州市）主持教务会议，讨论及制定的《四川宗座代牧区章程》经梵蒂冈批准，除要求四川、云南及贵州等地教会付诸实行外，还作为样板，通行中国各教区及朝鲜、安南（越南）等国教会，参照执行，影响非同小可。四、民教冲突（教案）多，赔款巨。从清咸丰年间起，至民国初年，民教冲突在四川各地屡屡发生，粗略估计，大小教案百余起，居于全国各省之首；教案赔款也列于全国之冠。

对于四川天主教传播史及活动特点，教内外也不乏人乐意认识，阐述传播史，概括其特点。20 世纪初，古洛东（François Gourdon）神父经历多年努力，依据部分残存资料，撰写《圣教入川记》等著述。因受资料等的限制，古洛东亦承认其论述记载不全，仅系一部粗线条的简史。然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创之功，难以磨灭。

稍后，洛内（Adrien Launay）利用其服务巴黎外方传教会图书馆的机会，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略加整理，出版《四川传教史》（上、下两册）等数省传教史。的确，洛内为搜集及编排教会史料费尽心力，非常辛苦，为认识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播史保存与提供第一手材料，功德无量。但因涉及地域太广、跨度过长，洛内在搜集资料时，偏重数量，辨别较欠缺，只将相关资料按时间编列而已。因其未审订及辨析部分材料，真假混杂。而今我们在使用时，还得多费功夫。

美国学者鄢华阳（Robert Entermann）对天主教在四川早期传播史情有独钟。他在哈佛大学以研究清代四川移民而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仍专注巴蜀地区，从认识移民拓展至研究天主教，撰写数篇颇有份量的论文，阐述清前期天主教在川的活动及其特点。

沙百里（Jean Charhonnier），作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神职人员，对该会在华传播历史深怀敬畏，对清代中叶四川国籍神职人员及教徒的传播努力尤感兴趣。据他统计，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 300 余年历史中，共有 4252 名会士，内 1204 名会士被派到中国从事传教活动；在中国活动的会士中，有 306 人又来到四川。仅这两个数字就表明中国、四川在该会活动史中的独特地位，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过，仅靠这些传教士使天主教在四川等地扎根、发展及长期延续，是不可能的。教务的支撑、信仰的传承，需要大批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中国神职人员及普遍信众的奉献，前赴后继，薪火相传。沙百里视角新颖，

眼光犀利，关注教会的底层组织，研究草根人物，曾撰写《中国基督徒史》，彰张那些不见经传的传道士、会长或贞女等在禁教期间为承续天主教的不懈努力、无畏奉献。

应该说，这些学者的研究，各有建树，拓宽及深入了对天主教在四川传播史、主要是清代传播史的认识。不过，就我所接触的论述而言，目前对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早期传教史进行全面梳理、系统研究者，应是郭丽娜博士的论著《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活动研究》。

郭丽娜博士擅长法语，熟悉天主教的礼仪与典籍，她学习、吸收并充分借鉴古洛东、鄢华阳、沙百里等学术前辈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洛内搜集的法文资料，凭借母语的优势，结合清代档案及史志文献等，审订比对，综合分析，深入研究，以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的传教模式为对象，从该会的成立、宗旨及特点切入，明确指出该会不同于天主教的其他修会，是以传教为己任的由罗马教廷领导的传教团体，因传教而产生、因传教而发展，传教成为该会的第一要务。于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如何改变“异教徒”的观念、转化成天主教徒成为该会首先考虑的目标。要完成这些任务，应该也必须培养及使用中国神职人员及助手，消除肤色“边界”，穿透语言屏蔽，化解习俗障碍，缩短心理距离，征服思想，改变观念，成为信徒。

当年，根据梵蒂冈传信部的要求，该会在章程特别规定传教士的工作顺序是：一、培养有能力的教士阶层；二、照顾新基督教徒；三、致力于皈化新教徒。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制定了走社会底层的传教路线。郭丽娜博士在仔细考察该路线提出的缘由及实施概况，总结其利弊得失后，认为该路线的贯彻“表现为教会割断与中央及地方政权的联系，对政府的宗教政策坐视不理，摆脱耶稣会的影响，自立门户，自行在地下发展；传教活动以大城市为轴心，转移入周边的乡

村，锁定广大社会底层人物为皈依对象，网罗游走于社会边缘的群众”；“后期随着本土神职阶层的成长”，教会得以加强管理，不断细化礼仪禁令，造就了一个信念坚定的教徒群众，并最终“促成了清代中期教会的繁荣”。路线是纲，纳举目张，适宜的传教路线确定了传播的对象及方式、活动的重心，决定到发展的进度，但是要落实该会传教路线的要求，需要相应的策略。

为了贯彻走社会底层的传教路线，巴黎外方传教会选择并积极实践传教人员本土化的策略：深入草根社会，接触底层民众，从中物色对象，选拔及培养为传教员（传教先生），辅助甚至替代神职人员，关照堂口；在每个堂口又委任会长，实施管理，落实责任；提倡贞女在家修行，鼓励其走出自闭，向毗邻妇女或女童宣传宗教；积极创办（男女）经言学校，传播教理，从娃娃抓起；编译或撰写宗教书籍，重视文字的功能；以及召开会议，商议及制定活动章程，规范行为，强化管理，等等。通过对传教本土化策略的具体认识，郭博士总结出该会传教策略产生了这样的特别后果：“四川教会根据天主教会的组织架构，在信仰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主教——神父——会长（或传道士、贞女）——教徒’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严格规范每个层次人员的行为，树立神职人员在宗教信仰上的权威，支持传道士、会长和贞女等基层传教人员的工作，对教徒实施双层监管，严申中国礼仪禁令，向教徒灌输宗教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他们的经济行为。这样的管理模式使大批教徒认同天主教文化和新的宗教身份，坚定地追随教会，有助于提高教会的活力，增强整个组织的凝聚力。”的确，这些策略的综合运用，维系了旧教友，巩固其信仰，发展了新教徒，形成及巩固封闭的教徒“社区”，故能抗御清政府多次的严厉摧毁而延续、而发展。不过，在认识到这些路线或策略取得成功之时，郭丽娜博士更认为“这种管理也具有明显的内

敛、保守和自我封闭特点，作为管理规范化标志的四川教务章程，更是隐含着文化割裂和自我文化标签的意义。教会试图在教阶制度基础上，将教会的权力架构和以血缘伦理关系为基础的本土宗法制度糅合起来，力促教徒切断与周边群众的文化渊源和政治经济联系，自我形成一张服从于宗教权力的严密教徒关系网。”概括得当，触及症结。

处于清政府禁教时期，采取自闭作法，或许在凝聚信徒之外，还能产生某些保护的效果。对于这种人为制造的自我封闭亦会产生恶劣的后果。郭丽娜博士从研究走社会底层传教路线中深刻地揭示出这样的事实。“从教外人的角度看，下层路线的非法性使教会似乎成为了一个社会底层群众的秘密组织，它漠视统治者的意愿，必然引起统治阶层的猜疑，加剧他们对教会的排斥；而且它人为地将四川底层群众分成两个在文化上相互对立的群体，教徒自以为‘异类’，教外群众对其侧目相待。”1844年，在法国的压力下，清政府放弃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由“非法”到合法，走出隐蔽状况，公开活动。然而，环境改变，因自闭而形成的对立，此时彰显为民教间严重的隔阂，隔阂滋生矛盾，矛盾酿成冲突，各地频繁爆发教案，民教关系更趋紧张……或许是清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路线及策略所派生的负面后果之一，事与愿违，始料未及！通过郭著的分析，我们清楚认识到清季四川各地频繁爆发教案的重要原因。

多年前，美国学者保罗·科恩（Paul Cohen）在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时，曾提出新教在华活动有两种不同的宣教方式：即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走上层”宣教方式和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走下层”宣教方式。20世纪80年代，对外交流，保罗·科恩提出的传教模式后传入中国大陆地区，治基督教传播史部分学者眼睛一亮，颇感兴趣，挪用过来，重新认识基督教的活动史。不过，保罗·科恩的研究结论

似乎缺乏些“东西”？换言之，“走上层”或“走下层”的宣教方式为什么能持续地发生作用，仅依靠李提摩太或戴德生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通过对西南民族地区基督教（原内地会系统）研究中得出，“走下层”方式之所以产生效力，在于基督教做到了本土化，化“洋”为“土”，变“西”为“东”，传教士深入底层，接触了解，化解隔阂，疏通关系，物色及培养本族宣教员。这些宣教员积极活动，自发建立“学堂”（如怒江傈僳地区“雨季圣经学校”等），灌输或培训，又培养新的传教者，辗转相传，施以影响，与文化或习俗结合，形成新的识别标志，认同与凝聚，形成特殊的“社区”。浓郁的氛围、封闭的环境，身居其间者受到濡化，不能不信，所谓环境改变了人、造成了人！

今阅读郭丽娜博士的论著，得知早在二三四百年前，巴黎外方传教会已在四川实施的走社会底层传教路线就是尔后基督教的“走下层”路线。其本土化策略更完备、更系统、更有效，因而能抵抗清政府百余年的严厉禁教而难衰败，薪尽火传，代代传承，长期延续。对四川天主教早期传播路线及策略的研究，拓展了我们对基督宗教史的认识。

毋庸讳言，对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研究是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薄弱部分，而走社会底层的传教路线、本土化策略更是治天主教入华传播史较忽略者。郭丽娜论著《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活动研究》填补了这些薄弱部分，发前人之未发，很有建树；亦解释了我认识四川等地基督宗教传播的多年困惑，令我豁然开朗！故不揣浅陋，表达感慨，谨为序也。

秦和平

2011年11月25日于成都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四川宗座代牧区	12
第一节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立	12
第二节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罗马教廷和 法国政府的关系	18
第三节 四川宗座代牧区	30
第二章 否定中国礼仪	43
第一节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中国礼仪之争	43
第二节 中国礼仪禁令在四川的实施	60
第三章 走社会底层的传教路线	70
第一节 新传教路线的提出	70
第二节 下层路线在四川的确立和实践	76
第四章 传教人员本土化的传教策略	86
第一节 神职人员的本土化	86
第二节 传道员阶层的建立	117
第三节 传教人员本土化的影响	127
第四节 传教的其他辅助手段	140
第五章 自我封闭式的管理	146
第一节 清代中期四川天主教会的发展状况	146

第二节 教会传教人员的管理·····	153
第三节 教会教徒的管理·····	164
第四节 崇庆州教务会议·····	182
第六章 不断恶化的民教关系·····	193
第一节 民教对立的原因·····	193
第二节 愈演愈烈的教案·····	207
余 论·····	234
一、小结·····	234
二、进一步讨论·····	239
参考文献·····	274
附 录·····	293
附录一:白日升和毕天祥的教务地界协议·····	293
附录二:巴黎外方传教会章程·····	294
附录三:1696-1820年入川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	295
附录四:1820年前四川天主教会华籍神父列表·····	299
附录五:传道员守则·····	302
附录六:童贞女修规·····	304
附录七:传教士行为守则·····	310
附录八:女子言经学校的管理规定·····	311
附录九:四川教徒领圣体前的祈祷词·····	312
后 记·····	316



导 言

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天主教在华传播历史研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的部分。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以法国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和遣使会三大组织的法国传教士的活动最为突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就目前国内教会史研究的现状而言，学界的目光仍相对集中于法国耶稣会，对于巴黎外方传教会和遣使会的活动情况和传教方式的研究相对薄弱，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7世纪80年代入华，在时间上较法国耶稣会略晚，但它是罗马教廷指定的在华天主教务代理人，地位非常重要，一直活跃在闽、赣、云、贵、川等省。清政府全面禁教后，传教会仍秘密活动于中国西南三省。晚清政府被迫容教之后，传教会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到西藏、华南和华北各省份，影响非常之大。晚清不少天主教案的发生，几乎都与巴黎外方传教会有关。

从传教地域上看，四川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最重要传教区域。到20世纪中叶为止，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蜀地经营教务长达两个半

世纪,期间四川天主教会经历过漫长的禁教时期,承受着严酷的外部环境。当国内其他省份的天主教活动风声鹤唳之时,巴黎外方传教会因应时势变化,及时调整传教策略和管理方法,适应环境,确定四川教会对内、对外的运作机制。新传教模式不仅使四川教会得以生存,而且使教会迅速发展,成为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奇迹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传教地域的典范,然而其内在固有的弊端也引致晚清四川教案的频频滋生。

对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的活动进行研究,四川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典型区域。理清四川早期天主教传教史既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清代天主教在华的活动模式,也有助于揭示晚清教案的部分深层文化成因。

一、国内外的四川天主教会史研究回顾

(一) 大陆的研究情况

四川天主教会史研究是国内教会史研究的方向标之一。《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四川的反洋教运动此起彼伏,斗争的激烈程度在晚清时期可算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国内教会史研究兴起,正是以四川教案作为切入点。1982年6月,首届国内教会史研讨会在四川近代教案史研究会的积极推动下,在四川大足举行,主题为反洋教运动与四川余栋臣起义。此后至1994年间,国内史学界又陆续举办过六次教会史研讨会,其中1985年和1994年两届均在成都召开。

纵观四川教会史的研究历程,以教案为起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

力图在材料搜集的基础上，重构教案的过程，横向考察教会和西方侵华势力的关系及其与四川近代社会的矛盾，探讨近代反洋教斗争的特点和教案发生的原因。^①

由于学术研究的客观历史背景和资料搜集存在若干客观限制，这一阶段的研究基调基本一致，特别是80年代的研究，一边倒地倾向推定教案的不断滋生是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李时岳认为“传教士介绍科学知识的目的是进行一场‘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的‘精神战争’，背后的督战者是贪婪的殖民主义者……法国一贯以天主教作为对外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②曾绍敏指出“四川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范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开拓经营，是为法国殖民主义势力侵略中国准备必要的条件……西方殖民主义者即以传教为侵略手段，中国人民即以反教会侵略势力为反侵略的一种形式”。^③

① 在资料搜集方面，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徐庆坚和伍仕谦的“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史料（《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和1958年第1期），四川省、市文史资料收集的相关口述材料，1985年四川省档案馆出版的《四川教案和义和拳档案》等。在研究方面，张力和刘鉴唐的《中国教案史》、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和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合编的《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冯祖贻和范同寿等主编的《教案与近代中国》以及李时岳的《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等论著均对晚清四川天主教教案做了大篇幅论述；论文有四川大学历史系的“1886—1898年四川大足教案始末”（《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张莉红的“‘成都教案’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林顿的“清代外国教会在川势力简述”（《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曾绍敏的“第二次重庆教案述论”（《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钟钢的“1895年成都教案简述”（《天府文物》1992年第4期）等等。

② 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③ 曾绍敏.第二次重庆教案述论.《教案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111页。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和新档案文献的出现(如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合编的《清末教案》刊行),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文化、习俗、宗教和社会心理差异等可能引发教案的潜在诱因,试图摆脱单纯政治侵略论的窠臼,转向讨论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共同诱发作用。^①比如唐毅指出过“洋教对四川人民传统文化社会习俗的冒犯是教案的主要促发原因。”^②由于材料发掘尚欠深入,对天主教在川传教的历史认识尚少,这些讨论多局限于罗列事实,欠缺深入分析,并未产生深刻影响。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教务教案档》等重要档案资料陆续刊行,客观上为史学界比较全面地了解天主教会在川的活动情况提供了可能,有助于史学界从漫长的传教历史中探究近代教案背后的文化成因的蛛丝马迹。此外,教会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得到肯定,这也使文化差异研究成为教案研究的新关注点。在这种情况下,四川教会史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考虑文化差异存在具有长期性和潜在性等特点的前提下,学界试图整合本土和海外资料,重构传教史,从文化交流的层面反思民教冲突的深层原因。

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员秦和平老先生率先利用清廷档案和地方史志,并到四川教堂、修院做实地调查,先后发表了四辑

① 参见刘斌的“近代四川天主教会述论”(《重庆师院学报》,1994 年第 2 期);唐毅的“四川反洋教斗争概说”(《重庆三峡学院院报》,1995 年第 3 期)和“略论近代四川教案的政治文化背景”(《文史杂志》,1998 年第 2 期)。

② 唐毅:四川反洋教斗争概说。《重庆三峡学院院报》,1995(3):60-65。

“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西南民族学院院报》，1998-1999年），为研究四川教会的早期活动提供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线索。随后，秦老先生又陆续发表了“试论民间戏曲对清季四川教案之影响”（《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和“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之认识”（《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论文，揭示了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会的传教方式、教徒状况和民教关系之地域特征和复杂性。其他学者如张丽萍等人通过实地考察和发掘当地史料，归纳出清代四川天主教徒社区的三种形成方式，从“宗教之矛盾，从小社区与大社会两方之间的‘逆反心理’”，提出“天主教社区的形成，对天主教会来说，是其在四川生根、发芽的良好土壤——带来的巨大潜力和价值，具有持久性、示范性、基地性的意义。但是，它带给四川更多的则是对国人的刺痛和对社会的撕裂。特殊背景下壮大起来的天主教社区，在改变小群体的信仰和生活的时候，的确也在制造社会的动荡、造成内部的撕裂”的观点。^① 这些研究引用新材料，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出四川教徒本来世居本土，姓名、言语、衣冠与本地百姓无异，但却因信教而与主流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对探讨近代四川教案的文化成因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时至今日，史学界基本认同近代四川民教冲突的滋生不仅起因于晚清列强对华的武力入侵，亦源于民和教两个异质文化

^① 张丽萍、郭勇：《帝国汪洋中的孤岛——从清代四川看天主教在汉地的农耕社区》，《宗教学研究》，2005（3）：176。

团体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难以逾越的文化隔阂。但是由于四川当地缺失充分的早期教会史资料，足以展示教会的具体活动模式，所以至今尚未有说服力较强的专题研究问世。

（二）港澳台的研究情况

由于着眼点不同，港澳台的教会史研究学者比较关注当地教会的发展情况，对四川天主教活动进行专题研究的不多，不过部分有影响力的教会史综合研究成果，有从外人侵略的角度对四川天主教案进行分析。^① 比如吕实强在《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中，从“华夷之辨”、“人禽之辨”和“基督教本身的教理”等文化和伦理方面论述儒家传统与群众反教的关系，而他始终认为“源于儒家‘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与基督教义本身，并无冲突”，“其次就‘人禽之辨’的传统观念而言，若干观念，基本上与基督教亦并非决不相容”，“唯对基督教本身的若干批驳，则甚难协调”，“总之，基督教在华传教一事，如不用政治武力强迫推行，虽未能全面免于冲突，但未始不可以和平方式为主，有主见的相互了解，而达于彼此交流与融合，其所以引起许多重大不幸的惨案，所关乎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根本者，并非甚多，而出于人类贪婪自私的因素，实为主要。”^② 在《教案与反西教》中，吕实强和张秋雯分别评述了四川重庆教案、大足余栋臣起义、成都教案和巴塘教

① 如李志刚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罗光的《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教案研究专辑《教案与反西教》等。

②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民国55〔1966〕，第195-200页。

案，并重申上述观点，认为“从引发教案的原因来看，尽管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诸如儒家传统、社会习俗、官绅利害等等，无一不与国人的反教有关，但两次重庆教案的发生，最主要者却为属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侵略特质，对外人的一种疑惧和反感。”^①

此外，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硕士生李晋荣曾利用《教务教案档》，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切入，对四川教案进行归类（1984年），在“将清季四川省之教案事实加以阐明”之余，得出“民教冲突常起因于单纯事件，如争地产，起口角，习俗不同而生的齟齬……可以察觉到民教冲突是文化性的冲突；两个不同文化体系的接触，摩擦是必然的”^②的结论。但是该论文仅限于罗列事件，未就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作进一步解释或探讨，令人有言犹未尽的感觉。

（三）海外的研究情况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在四川活动时间最长和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传教团体，其档案室保存大量在川传教会士与总会交流的往返信件和教会发展情况资料，是四川天主教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作为四川教会的前直接管理者，巴黎外方传教会非常注重文献的整理和编辑，其档案学家一方面根据入川传教士的书

① 吕实强. 重庆教案. 《教案与反西教》.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334 页。

② 李晋荣. 清季四川教案之研究.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第 173 页。